发展规划简报

第100期

华大报字（部）04号

华侨大学发展规划处 编

2014年10月20日

【专家视点】※中科院院士谈人才：扭转科研经费“重物轻人”倾向

※走出科研经费管理的困局

※整治科研腐败需要新思路

※大学章程亟需从纸上走到路上

【它山之石】※中南大学校长张尧学谈综合改革

※《厦门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2011-2021）》成效初显

※克罗地亚：反学术不端预防重于惩治

【校内传真】※我校分别与德化县人民政府、德化县医院以及中科院福建物构所（海西研究院）签订合作协议

※六合院董事长朱志悦捐资500万元 设立华大海上丝绸之路研究院研究与发展基金

※我校教师近日获多项重要成绩

【专家视点】

中科院院士谈人才：扭转科研经费"重物轻人"倾向

编者注：南京大学校长陈骏和南京工业大学校长黄维是出自不同专业的人才，一个是矿床学博士，中国科学院院士；一个是理学博士，中国科学院院士。两位院士不约而同地认为，与世界科研水平先进的国家相比，我国缺的并不是设备等物质条件，而恰恰是人才和科学有效的人才保证制度。主要采访记录如下：

记者：近年来，我国科技投入持续大幅度增长，实验室的仪器设备几乎与国外相当，但科技创新却仍存在原创性不足、突破性成果少等问题，原因何在？

陈骏：这首先反映了科研资源配置的不合理。2013 年，全社会研发支出占 GDP 的比重达 2.09％，但这些资源并没有得到科学配置。举个例子，我们大多数教师和科研团队至今仍习惯于自由探索式科研，满足于小而零散型成果，缺乏针对学科发展前沿和国家需求的战略规划和研究，很难产出高水平科研成果。另外，从总数上看，重大项目经费很多，但这些经费大部分用来买设备了。一位院士曾说：“我们每一个重大项目的实施，都是外国实验设备商的一次盛宴。”

黄维：问题恰恰在于，尽管我国实验设备很先进，但人的差距还是有点大。目前，科研经费使用存在“重物轻人”的倾向。换句话说，大量经费都用来买硬件，忽视了对科研的软投入，而人力资源恰恰是科学研究中最重要的因素。

记者：我国重大项目中人才经费提取比例与科研水平先进的国家相比，到底有多大差距？

陈骏：我国自然科学基金经费管理办法规定，用于直接参加项目的研究生、博士后的劳务费最高为总经费的 10%—15%，但这部分费用不能用来开支基本科研队伍人员的工资。我国国家科技计划经费管理办法规定，劳务费预算确定需要通过国家部委的专家评估、评审，支出需按各校财务规定。由于各方面原因，目前一般只占到总经费的 25%左右。而在美国，人员费用占总经费的比例相当高，加起来可达 45%左右。

黄维：国家层面也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2011 年，财政部与科技部联合出台了《关于调整国家科技计划和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经费管理办法若干规定的通知》。通知规定，人员绩效可以从所承担课题的间接费用中支出，总额不超过直接费用扣除设备购置费后的 5%。但实际上，这个比例仍然小

了些。以一个 1000 万元的项目为例，即使不买设备，拿 5%也就是 50 万元来做绩效支出，分到团队每个人头上，可能一年最多只有 1 万元绩效收入，而如果去掉设备费，绩效收入就更少了。

记者：在不久前的两院院士大会上，李克强总理提出，“要把更多资源用在‘人’而不是‘物’上”，对此，两位有什么建议？

陈骏：我认为，首先要改革科研人才保证制度，激发科技创新的内在动力。我国科研经费中人才经费一直比例过低，以人为本的思想没有彻底贯彻，一定程度上造成经费浪费，同时也易滋生腐败。提高项目中人才经费提取比例，就是把科研经费用在刀刃上，激发人才的创新激情，这也符合科研活动规律。

其次要改革科研人才保证制度，激发科技创新的内在动力。当代科学发展的复杂性与综合性，已使得大多数科学问题的解决都不能仅仅依靠单个科技工作者或课题组，科研团队已成为科研活动组织的基本单元。例如，南京大学的“大师+团队”模式，就极大地提升了学校教学科研水平，全校 30 多位院士级大师带动各自团队，培养锻炼了一批高层次创新人才，部分人才已成长为国家“863”“973”项目的首席科学家。

黄维：为鼓励有一定学术积累和较大发展潜力的青年才俊脱颖而出，南京工业大学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对取得突出成绩的教师特别是青年教师，给予各类启动经费、科研奖励和绩效补贴。尽管这些举措取得了很好的成效，但无疑也增加了学校的财政负担，或多或少稀释了学校在人才培养这一核心任务上的资源配置。我一向认为，高等学校的中心任务是培养人才，国家、社会、企业才是支持科研人员科技创新的主要责任方。在这方面，德国洪堡基金会、日本科学促进会、新加坡国家研究基金会和国家科研局都有非常成功的经验可供我们借鉴。譬如德国洪堡基金会，一方面资助德国学者到国外游学、拓展学术思路和合作网络，另一方面邀请外国有才华、有基础、有潜质的青年科学工作者到德国高等学校和科研机

构从事科研工作，并为他们提供丰厚的奖学金。近年来，新加坡在这方面更为成功，通过提供优厚的奖学金支持，吸引了一大批活跃在科学技术前沿的青年科学家到新加坡国立大学和南洋理工大学任职，在相当程度上支撑了这两所曾经默默无闻的高等学校迅速跻身世界大学排行榜的前列。我国政府有关部门，如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不妨借鉴这种方式，创立类似的人才基金，以吸引世界各国优秀科研人才，为我所用，特别是处于创新、创造高峰的青年科技人才。（来源:《光明日报》）

走出科研经费管理的困局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院长 喻 中）

中国科学院院士李宁挪用科研经费一事，引起了媒体与学界的持续关注。这样的典型事件既拷问科研人员，同时也拷问现行的科研经费管理方式。

科研人员将科研经费挪作它用，把应当用来购买实验仪器的钱用来购买其他东西，让科学研究失去了经费保证，当然是一种需要追究责任的行为。从法律上说，一个科研项目的立项，就形成了一个契约：资助者向研究者支付一笔经费，研究者运用这笔经费，完成向资助者承诺的研究任务。如果科研经费来自公共财政，那就是国家与研究者之间的契约；如果科研经费来自企业，那就是所谓的横向课题，研究者如果不能完成预定的研究任务，作为出资方的企业也会要求追求研究者的违约责任。对于科研人员来说，没有按照合同的约定完成预定的研究任务，无论在法律上还是道德上，都不能得到豁免。

然而，制度更具根本性。相对于科研人员的问题来说，科研经费管理制度中存在的问题更值得注意。作为支持、资助科学研究的科研经费，既应当用于购买设备，同时还应当用于支付科研人员的劳动。现有的科研经费管理制度严重忽视了科研人员的劳动。科研经费可以用于买电脑，买打

印纸，买飞机票，买火车票，但绝不能用于吃饭，通常也不能支付科研人员的劳动。这是有问题的。科研经费首先应当支付的费用，是科研人员的劳动。

这在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领域尤其明显。研究朱子哲学，严格说来，只需要研究者投入时间、精力、脑力劳动就可以了。几乎不需要买电脑，甚至也不需要买飞机票。如果研究人员成天东奔西跑，像“华威先生”那样出入各种场合，他还有时间、精力、心情沉潜于朱子哲学吗？譬如钱钟书先生，他的研究方式就是安静地坐在书桌前，仅此而已。如果给钱钟书先生立一个科研项目，科研经费 10 万，我想，他的科研经费大概很难花得出去。

现在，科研人员可以申请的科研经费渠道较多，经费的数额也增长了不少，但是，科研经费的管理方式越来越僵化。譬如，去外地调研，既需要有往返的机票或车票，还必须有与之相配套的住宿发票。如果你晚上在农民家里借宿，没有住宿发票，那么，你的机票或车票也不能报销。

科研经费的管理应当有助于激发科研人员的科研热情和创造力。只要他能够做出事先承诺的研究成果，钱怎么花，是他自己的事情，政府或科研管理者不必过多干预。如果管理部门对他不放心，或者认为此人心术不正，那就不给他项目好了。用人不疑，既然认为此人值得信赖，值得托付，那最好在科研经费的使用上尊重他的意见。

与此同时，实行严格的成果评审制度，强化科研管理中的结果导向。这就是说，在科研管理、特别是在科研经费管理中，核心的管理任务，是审查研究者是否完成了预定的研究目标，是否取得了预定的研究成果，而不是研究经费的使用方式。把管理的重心放在研究经费是否被“挪用”上，是一种本末倒置的做法。

实现结果导向的科研管理机制，淡化科研经费使用方式的管控，增强科研人员在科研经费使用中的自主性，维护科研人员的尊严，激发科研人员的创造能力，是走出科研经费管理困局的正道。（来源：《社会科学报》）

整治科研腐败需要新思路

（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陈 辉）

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宁挪用科研经费的事件曝光后，引起人们广泛关注。李宁头顶一系列常人难以企及的光环：中国最年轻的工程院院士，克隆技术、转基因研究的学术领军人物，国家顶级科研基金的获得者，这位重量级学者竟然涉嫌将千万科研项目经费转移至名下公司，令人匪夷所思。我们需要反思的是当前科研经费使用中频出问题之原因何在？是否具备有效的治理办法？在我看来，其原因主要存在于两个环节。

首先，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公私不分，公与私之间缺乏明确的界限。费孝通曾用“差序格局”来说明，以“己”为中心，犹如石子投入水中，一圈圈推出去，由己到家，由家到国，由国到天下，公与私之间未有明确的边界。作为研究者，经过激烈竞争申请到科研经费后，往往将其视为己有，缺乏应有的规则意识、边界意识。这与公权私用、以公权谋私如出一辙。

其次，当前科研经费的管理体制有问题。科研项目的评审需要在公正、平等、竞争的健康环境下，以研究质量为学术优劣的唯一标准，同时项目申请与评审之间应当有严格的回避制度，而不能仅仅是形式回避。从李宁事件中我们可以看到：李宁既是重大项目的评审者，也是这些项目课题的申请人，形成了既当裁判员又是评审者的双重身份。同时，科研项目的零余额制，即到项目年度截止时间时余额会被行政部门收回，并且这还会影响到下一年度的科研经费下拨甚至额度申请，这就往往使得项目承担者在年底突击花钱甚至将余额转移至公司名下。人性皆有善恶，好的制度不让人们有贪腐的机会。政府主导型的科研评审制度抑制了科研竞争的活力与创造性，并且使基金的获得与权力、地位紧密相连，而不是以研究的实力与创新为基石。

由此可见，这两个方面的原因本身也是紧密联系的，一言以蔽之，缺

乏科学的精神与科学的管理。整治科研腐败与经费使用不合理的问题需要有新的思路与方法，要改变过去“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碎片式治理的方法，采取整体性治理，标本兼治，才能实现科教兴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首先，注重科研人员操守意识的养成，明确各类科研基金使用的边界，即基金的使用范围，何者能用以及何者不能用。孔子云:“不教而杀谓之虐”。要形成基金项目使用的规则意识，优化科学研究的学术氛围与良好环境，充分发挥科研人员学术研究的主导性与积极性，使广大科研工作者在研究中能如鱼得水，以研究为乐，这是至关重要的。以美国为例，科研基金的使用主要用于工资薪水以及实验器材（美国大学教授一般有三个月的薪水可从科研基金中获得，因为从学校只能拿到 9 个月的工资），另外则用于研究生的津贴以及会议所需。

其次，深化政府主导型的科研项目管理体系改革，引入竞争机制，注重结果导向，通过市场力量进行深度变革，改变科研评审的行政化趋势。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客观、公正与独立是提升科学研究质量，形塑一流教育与科研的活力之源，舍此而科学技术的精进别无它途。20 世纪 80 年代，日本政府发起了“第五代计算机”的重大项目，一个庞大的拥有 1000 个处理器的并联式计算机，由于难以说服市场力量即工业家、银行家以及风险投资家的参与，日本外贸与工业省（MITI）投资 4 亿美元。欧洲的政府奋起直追，英国发起了 Alvey 计划，欧共体（EEC）发起了 ESPRIT 计划，结果欧洲和日本的纳税人在计算机科学上 8 亿美金的投资都失败了。成功属于美国，自由竞争的市场机制产生了 IBM、微软、英特尔、奥雷克尔数据库、苹果这样的公司，并产生了一系列打遍世界的袖珍计算器、微机、操作程序和个人计算机（PC）。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瑟·刘易斯曾言：“政府的失败，既可能是由于它们做得太少，也可能是由于它们做得太多”，斯言是矣！（来源:《社会科学报》）

大学章程亟需从纸上走到路上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储朝晖）

编者注：如何在未来切实依章办学是比制定章程更大的挑战，也是更有实际价值的过程。唯有在办学过程中执行和落实了章程，并不断修改完善，现代大学才能修成正果。

近日，教育部核准发布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南开大学、浙江大学、中南大学、中山大学、电子科技大学、西安交通大学等 9 所高校章程。根据北京大学章程，该校首次创设监察委员会。该委员会对学校机构及人员具有检查权、调查权、建议权、处分权。

一百多年前，许多教育界有识之士就知道办大学必须有章程。当时无论是北洋大学自拟后上报朝廷批准，还是京师大学堂由朝廷直接任命权威专家制订，都是先有了章程再办学堂。

然而，这个常识在新中国的大学中被遗弃得太久，以致于花了很长时间，浪费了很多人力财力，处于失范状态的大学未能培养出杰出人才，荒废了几代人的青春年华，拉开了与世界前沿大学的距离，留下几十年惨痛的教训。

正因如此，大学再次找回章程算是找到了常态发展的方向，大学章程的发布算是摸到了现代大学的门槛。

当下，除了已经核准发布的 32 所高校章程外，其他 15 所“985 工程”高校的章程都已完成了核准程序。对此，很多人油然而生的是走到这一步的艰难曲折和喜悦。然而，必须清醒地看到，走到这一步也仅是高校章程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对于整个大学制度建设而言也仅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

如何在未来切实依章办学是比制定章程更大的挑战，也是更有实际价值的过程。唯有在办学过程中执行和落实了章程，并不断依据实践中提出的问题和广泛的民意，随时凝聚新的共识，通过合法的程序和通道修改完

善章程，现代大学才能修成正果。

现实中，一些大学的规章制度仅仅挂在墙上的现象并不少见，章程颁布后会不会出现这种现象依然是个未知数，且客观上确实存在不少依章办学的障碍。

首先是思想观念上，依法自主办学这一章程的核心精神深化和普及得还不够。由于普遍存在对现代大学制度认识的不完整，大学里的师生习惯于被支配和指使，或干脆支配指使别人，还不适应“师生共治”，对自己究竟有哪些权利、哪些责任没有明晰的认识。大学管理者对哪些事应该做，哪些事不应该做，也没看明白，有意无意凌驾于大学章程之上的言行时常出现。

再就是中国大学师生的参与意识普遍不高，没有师生参与的章程就如同没有人参加的比赛，就不会生成实践意义和价值。另一方面，由于管理观念的陈旧，一些管理者把参与学校事务的人当刺儿头，常给他们穿小鞋，于是很多人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抑制了参与感。所以，在章程落实的过程中，需要有人站出来依章较真，这样才能使章程对学校的发展切实发力。

此外，类似“政校分开”等问题即便写进大学章程，目前依然存在管理体制的障碍，如何落实在现实中会遇到很多困难，也不是一两所大学所能做到的。在这方面亟需一些地方和学校在实践中探索。

事实上，在高校的内部治理方面，无论是过去还是当今世界的先进大学，都有不少值得借鉴的例子。而当下众多大学面临的难题是通过什么路径走到那一步。要解决这个难题，必须有越来越多的人真正解放思想，让自身的改革实践跟上落实章程的步骤。

细致分析已公布的各校章程，依然存在一些缺陷，如操作性的不足、责权主体表述上的不周严、监察与执行同体或存在牵连，加上现代大学需要在完善的社会法治环境中才能真正建立，所以各校章程的颁布仅仅是个门槛，千万不能躺在门槛上睡觉，还应鼓励所有学人都走进去努力创建现代大学。（来源：《中国教育报》）

【它山之石】

“我们现在先不谈创新”

——中南大学校长张尧学谈综合改革

“大学最本质的任务不是创新，而是传承人类良知”“青年教师不许上讲台”“教授不上讲台得被重罚”“校长要把经营放在第一位”——这些看起来有些“离经叛道”的主张，是中南大学校长张尧学的治学理念。

2011 年 11 月，张尧学离开教育部到中南大学履新，随即在学校掀起一场全方位的综合改革。

经过近 3 年的改革实践，中南大学的变化从容喜人——学生喜欢学校，青年教师安心科研，知名教授回归讲台，国家科技奖数量跃居全国第五，行政成本大幅降低。中南大学的改革实践，不仅闯出了中国高等教育综合改革的一条新路，也给传统的办学理念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

冲击一：不要把创新当成首要任务

“大学首先是教书育人的地方。现在大家对大学的定位有一个误区，那就是过于强调创新成果、论文数争创一流等，这样很容易把学生给忽略掉。”张尧学指出，创新重要，但走在创新之前的，应该是人类良知的传承和学生价值观的塑造。他说：“我们现在的改革，先不谈创新。”

“在学校里被关爱、受重视、找到归属感，才能确保一个学生形成健康人格和正确价值观。”学校新闻发言人刘建华介绍，在精神层面上关怀学生，比如开放校长信箱、校长每天亲自处理学生投诉、投诉与职工年终奖直接挂钩。

中南大学投入巨资用于保障学生的生活与学习。学校全面改造宿舍与食堂环境，对学生吃的每份菜补贴 10%，拿出 1 亿多元为宿舍安空调，每年每门课给学生配备 20 万元实验经费，2013 年发放奖学金近 3 亿元。

学校通过推行教学改革，让课堂学习成为一种享受。此外，学校还大

力精简课程为学生提供更多自主学习空间，推动实验室 24 小时向本科生全面开放，建立完善多级创新训练平台和模拟创业平台等相应措施。

多措并举，中南大学卓有成效地为学生提供了一个安心、宽松、开放的学习科研环境。科技部 2013 年发布的 2012 年世界顶级杂志论文数量排名中，中南大学名列全国第四；近 3 年的创新创业活动中，中南大学先后有 84 人次获国际奖项、1034 人次获国家级奖项。

冲击二：青年教师不许上讲台

“副教授、教授必须上讲台，青年讲师不许上讲台。”2012 年 9 月，中南大学的这项新规一出台，便引起巨大争议。

“教授要把最前沿的研究成果带到课堂，让学生享受最优质的教学资源。”张尧学力排众议，“青年教师没有实际科研经验和足够生活阅历，还要应对住房、婚姻等诸多压力，直接上讲台，容易把一些社会焦虑传递给学生。”

那青年教师做什么？中南大学明确，所有新教师都有 8 年时间用于自由探索，可以自选科研方向，有 20 万元科研经费供自由支配。“ 8 年期满拿不出成果、升不了副教授，就得自动走人。”张尧学说，“要知道，诺奖获得者的获奖成果，基本上都是 35 岁前做出来的。就是要把最具创造才华的时间交还给年轻人。”

与此同时，中南大学强力推动教授回归讲台，把 90%的绩效金分配给教学岗位。一名国家二级教授每周给学生上 4 小时课，就可以有 20 万元至 30 万元的年收入，不必再为拿不到科研任务而苦恼。

冲击三：校长要把经营放在第一位

“大学校长要把经营放在第一位。”一上任，张尧学就这样明确了自己的职责。那么教学、科研、人事、奖惩等工作由谁来负责？他的答案是：“把权力下放，让教授委员会成为学校的具体管理者。”

3 年来，中南大学综合改革的一大方向就是全面放权，学校层面主要负

责制定政策，人事任用、职称评审、奖金分配等“实权”都下放到二级学院，由教授委员会和学院党政联席会议共同决策。校办主任蒋建湘介绍，各学院教授委员会委员实行任期制，连任不得超过两届，为的是避免长期任职可能带来的潜规则。

“校长管好全校的经营，才能确保师生埋头于学问。”张尧学强调，“学校发展处处都需要资金，这才是校长最需要操心的任务。”

任校长近 3 年，张尧学从来没跟国家额外申请过资金，中南大学没有一项改革因为缺钱而难产。他心里有一套举重若轻的妙招：首先从资源重新分配入手，把教学资金全部投到人员身上，不再投钱给设备。其次，大幅压缩行政经费。“遇到阻力怎么办？学校把节约的钱给大家涨工资呀。”此外，学校广开财源，下大力气募集捐助资金、推动产学研合作、加大社会培训力度。

如今的中南大学里，看得到官本位的消融，看得到创新思维的涌动，看得到师生们焕发的能量。综合改革，润物细无声，奏出充满活力与希望的华美乐章。（来源:《光明日报》）

吹皱人文社科的一池春水

——《厦门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2011-2021）》成效初显

2012 年 12 月 15 日，厦门大学召开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大会，发布《厦门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2011-2021）》（以下简称“繁荣计划”）。根据该计划，从那时起，厦门大学将在原来基础上，每年新增 1 亿元经费用于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力争到 2021 年建校百年时，形成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厦大学派”。

这被外界解读为厦大正式吹响了未来几年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冲锋”号角。

如今，繁荣计划已深入实施了近两年。也许，不到两年的时间，谈显

山露水的成效为时还早，但是，师生们已清晰地感觉到，在繁荣计划这股春风的吹动下，厦门大学人文社科研究呈现出一个又一个细微的变化，这些变化如一圈圈的涟漪在厦大人文社科研究的一池春水中激荡开来并渐渐扩散至远方……

从单兵作战到联合攻关

三个月前，厦门大学“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协同创新中心”迎来了教育部专家考评组的实地考评验收。若验收通过，就意味着这个刚成立一年多的中心将跻身于国家队的“2011 协同创新中心”。

别看时间短，但是这个中心“来头”可不小。它由厦门大学牵头，与复旦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和福建师范大学共同建设，可以说，中心集合了海内外从事台湾研究的代表性学术机构、知名学者和实务部门的专家。根据规划，中心将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重大理论创新”、“两岸经济一体化”、“两岸社会整合”、“两岸文教融合”、“两岸共同事务合作治理”等五大领域展开协同创新研究和实践。

“中心建设的原则是强强联合，优势互补；建设目标是瞄准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打造‘顶天立地’的研究集群，”中心执行主任、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院长刘国深说，“我们正在走出学术象牙塔，加强实证研究和应用研究，着力把这个中心打造成海内外最具权威性的台湾研究思想库、人才库和信息库。”

在社科处处长陈武元看来，像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协同创新中心这样的“联合攻关”平台或形式，正在成为厦大人文社科研究的一个大趋势。他说，自繁荣计划推出后，社科处花大力气抓大平台建设，就是要整合校内或各个学院内部不同层次的优势资源，搭建“跨界”大平台，形成强强联合的集群攻关科研局面。

让陈武元欣喜的是，近两年来，大到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协同创新中心，小到某个学院内部的课题组，这样的“跨界”合作越来越多。2013 年 11 月，

厦门大学“能源经济与能源政策协同创新中心”被认定为福建省“2011 协同创新中心”。2014 年 7 月，公共服务质量研究中心、海洋法与中国东南海疆研究中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中心三个基地正式列入福建省社会科学研究基地的建设行列。

不一样的平台，带来了不一样的收获。台湾研究院年轻的张羽教授就在这样的平台中受益。2013 年 9 月，41 岁的张羽作为首席专家主持的“海峡两岸历史文化教育中相互认知、表述、态度及影响研究”项目获当年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立项，课题经费 80 万元。

时至今日，张羽还一直坚持认为，单凭自己，是无论如何都拿不到这个重大项目的。“课题组 90%的成员来自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协同创新中心，这其中便包括陈孔立老师、刘国深老师等一批资深台湾研究专家。”

她记得，当时和自己竞争这一课题的对手，无论是资历上还是光环上，都要胜出自己很多，但是评审组最终还是看到了站在张羽背后的强大的学科和人才支撑力量，决定将这一重大课题给厦门大学。

课题组也未负重望。自立项以来，课题组在海峡两岸历史、文学、教育、社会学、法律等领域深入进行跨领域、跨专业、跨两岸的学术研究与田野调查，已在涉台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台湾特色的中华文化”的建构》等 6 篇学术论文，向国家有关部门提交了一份决策咨询报告，并完成了 1500 份的“两岸学生历史文化教育认知状况”问卷调查。目前，课题组正在对问卷数据进行分析，不久将陆续推出《两岸学生对中华传统文化及地域文化的认知》、《两岸学生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认知》等系列调研报告。

从理论思辨到实证实践

明年初，一个占地 220 平米的公共政策实验室将在公共事务学院楼内投入使用。

建成后的实验室，将由公共政策仿真平台、社会科学计算平台、案例分析中心三部分组成。届时，公共事务学院的师生们将可以在这个全国高

校并不多见的实验室里进行政策的模拟、仿真等实验，身临其境地感受自己的相关研究的应用效应。

外人所不知的是，这个耗资 200 多万的实验室便是在繁荣计划的支持下建设的。公共事务学院副院长朱仁显表示，随着实验室的投用，该院师生的科学研究方法和人才培养模式将得到进一步的转变和创新。

曾几何时，不少人认为，做文科科研，一张纸、一支笔、一张嘴足矣。但陈武元说，这是老观念，现在得改改了。

他说，“繁荣计划”释放出了一个强烈的信号，就是要通过“加大对重点研究基地、实验室、研究中心、数据库和平台的支持”，促进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转变。“简单说，就是要从过去足不出户做科研转变为到田间地头做调查，从纯理论思辨转变为实证研究，一切要靠数据说话而不是凭个体经验更不能拍脑袋。”

对于研究方法的转变，经济学院的师生感受则更为明显。该院副院长陈建宝说，近几年，如果想在高级别的杂志上发文章，定量分析的研究方法就显得尤为重要。“如果不做定量分析，就很难发表。”

陈建宝说，近年来，经济学院一直在积极推动研究方法和范式的转型转轨，繁荣计划的出台则给学院打了一剂“强心针”，从硬件、资金、政策等多方面给予保障和支持。

该院的“计量经济”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厦门大学）和经济管理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便是推进这种研究方法转变的重要平台。该平台提供的远程高性能计算集群能够为经济学院和王亚南经济研究院的几千名师生提供不间断的建模、模拟和运算服务，实现“运筹帷幄之中，计算千里之外。”

与现代经济学接轨的研究方法助推了研究成果质和量的飙升。以 2013 年为例，该院教师共发表论文 284 篇，其中在《经济研究》、《经济学季刊》等学院认定的国内最优刊物上发表 44 篇，国外最优刊物上发表 12 篇。

从立足国内到对话国际

今年 9 月 12 日，厦门大学宏观经济研究中心首次将季度宏观经济模型

的预测发布会开到了德国，在欧洲发出了厦大声音。

这个发布会也是繁荣计划的受益者。繁荣计划共推出九大计划，其中一个便是“国际化战略和走出去计划”。

近两年来，借着繁荣计划的东风，各个学院明显加快了国际化的步伐。

据统计，近两年来，经济学院由国外专家开设的讲座超过 70 场，已举办 10 场国际会议，从国外高水平大学引进教师 10 多人，派出 30 多名教师出国进修学习。2013 年初，该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面向全球发行英文版《中国宏观经济展望》，是我国首份向世界发行的英文版中国宏观经济报告。

人文学院民间历史文献研究中心与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合作建设的“中国地方史数据库”，目前已扩充为“中国民间文献与地方史数据库”。该数据库运用 GIS 系统（地理信息系统）与数据人文技术，汇集了历史文献和田野调查资料，是国际首创的中国历史人文地理信息系统。

国际关系学院专门制定《关于资助教师和博士生赴东南亚进行国际学术交流的试行办法》，提供专项经费鼓励师生走出国门进行田野调查、课题合作，并积极参加在国外召开的国际学术会议。目前，该院已与美国、新加坡、韩国、马来西亚、荷兰、日本等国外十多所大学签署了合作协议。

管理学院 MBA 中心 2014 年推出国际 OneMBA 项目。该项目于 2002 年由美国、荷兰、墨西哥、巴西等国的 4 所国际顶尖商学院发起，是专为来自亚、欧和南北美洲卓越管理人员而设计的环球工商管理硕士课程，厦门大学今年加入。该项目在英国《金融时报》最近一次的全球排名中位列第 27 位。

公共事务学院以“孔子新汉学计划”和“繁荣计划”为依托，以国际学术交流和合作平台建设为载体，不断提升国际化水平和层次。目前，该院已与俄罗斯莫斯科大学，英国南安普顿大学、纽思卡尔大学，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等一批国外大学建立了实质性的合作关系。

……

就连一直被认为仅局限于两岸范围的台湾研究也在将眼光积极投向世

界。台湾研究院副院长邓利娟说，我们正在积极拓展与国外知名智库就台湾问题保持对话和沟通，持续扩大中国大陆在台湾问题上的国际话语权。“还要把我们的研究成果翻译成外文，向国际社会宣传我们的观点。”目前，该院正在积极邀请国际知名学者前来开设“外国学者看两岸”系列课程，作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协同创新中心内部共享课程。

来自社科处的一份资料显示，2013 年，学校作为第一完成单位被 SSCI 收录的论文共 60 篇，相当于学校整个“十一五”期间被 SSCI 收录的论文总数；以法学院陈安教授《中国的呐喊：陈安论国际经济法》为代表的 5 部专著已在国际最大科技图书出版公司之一的德国施普林格出版集团出版。（来源：厦门大学新闻网）

克罗地亚：反学术不端预防重于惩治

克罗地亚媒体上月透露，文化部一位高官被举报博士论文涉嫌剽窃。3 月底，克罗地亚最大在野党民主共同体的秘书长米利冉·博尔克奇的博士毕业论文被认定为剽窃，萨格勒布警察学院撤销了 2011 年授予他的博士学位，该学院同时宣布其颁发的另外 10 张学位证书无效。这一系列丑闻使克罗地亚公众越来越关注建立和完善预防及惩治学术不端行为的机制。

克罗地亚高校及科研机构中的剽窃行为并不少见。萨格勒布大学是克国最大和最顶尖的大学，该校去年的一项调查结果令人震惊：在 6287 名参与调查的学生中，72.5%有过抄袭行为，里耶卡大学这一比例甚至达到 75%。克罗地亚一个知名的医学杂志利用反剽窃软件对投稿进行检测，结果发现，14%的稿件存在抄袭嫌疑。其编辑称，其他影响力较小的杂志剽窃现象更加严重。

究其原因，一是风气问题。不少学者及编辑反映，人们发现剽窃行为后往往并不愿意举报，因为在克罗地亚学术界，指出某人剽窃或其他学术

不端行为往往被认为是人身攻击，并会招致报复。此外，该国学术圈子比较小，只有不到 1 万名专家学者，学术文章的作者和编辑往往相熟甚至是朋友，因此容易把关不严。一些人文科学杂志的编辑甚至会编辑刊出自己的文章。

二是处理程序及机制不透明。有不少人抱怨，他们发现剽窃行为后想要报告，却发现举报机制很不透明，不知道应该向谁举报，谁有最终裁决权，裁定的期限是多久。一些学术不端的案子经常在几个不同委员会之间来来回回好几年，才会得到一个最终结论。

三是对剽窃行为认识不足，惩戒不严。一些专家认为，由于有关剽窃的法规较为简单，部分学生及学者对“剽窃”理解不当，甚至还有人认为只有全文抄袭才算剽窃。即使被认定为剽窃，被学术期刊正式通告并撤回文章的仍然很少。至于因剽窃论文被撤销学位者，只要经过重新考试并重写论文，还可以再次获得学位。

近年来，克罗地亚政府及学术界意识到，要整治学术风气，预防胜于事后惩罚。目前采取的预防措施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学术机构内部的主动防范；二是外部监督及评价机制。除了制定相关的内部规范并设立专门机构，克罗地亚高校更注重通过培训和研讨会等形式进行防范性教育，提醒师生警惕和避免剽窃等学术不端行为。萨格勒布大学还专门制作了相关的教育影片，以更直观的形式来阐释哪些是学术不端行为，如果发生或发现类似行为应如何处理。所有新生及新入职的教职工都必须观看此类影片。

此外，一些大学还引进了反剽窃软件，以浏览和对比用克罗地亚语及其他语言撰写的文章，及时发现抄袭行为，效果显著。一些克罗地亚杂志如《社会生态学》为避免发表涉嫌抄袭的文章，专门规定，作者投稿时必须签署声明，保证其提交的文章是本人作品，而且要求作者确认所提交的是全部标明出处的最终版本。

克罗地亚科学和高等教育机构负责人雅斯米娜·哈弗兰尼卡在接受记

者采访时称，对付学术不端行为，事先预防更能避免其造成的不良影响。近年来，克学术界非常重视外部监督和评估制度的建设，除了学术机构内部的主动防范机制，还在全国范围内制定了教育和学术资质“再认证”制度。未来几年内，这一机制对克学术质量和风气的提高将逐渐显现出良好效果。从2010~2011学术年度开始，克25家研究机构及近百所大学成为第一批接受“再认证”的机构，到明年年底前，余下的所有高校及机构都必须接受此项评估，具体工作由克科学和高等教育机构负责执行。

“再认证”的具体过程是，每个机构先提交一份自我评估文件，在此基础上，由国内外知名专家参与的评审委员会对该机构进行实地考察。其评价标准中重要的一项就是：在科研及教育工作中有无不端行为，有无对此类行为进行预防、发现及惩戒的机制及行动。评审结果出来后，克罗地亚科学和高等教育机构会将其报送克科学、教育和体育部，由部长来决定是否颁发新的资质证书，或吊销其原有资质证书，或责令其限期整改。这种“再认证”的周期为每五年进行一次。（来源:《光明日报》）

【校内传真】

我校分别与德化县人民政府、德化县医院以及中科院福建物构所（海西研究院）签订合作协议

10月14日，我校分别与德化县人民政府、德化县医院签订合作协议，进一步建立全面、稳固的战略合作关系，德化县医院并挂牌为“华侨大学附属德化医院”。签约仪式在德化县政府公务大厦举行。华侨大学副校长吴季怀、德化县人民政府常务副县长吴顺情分别代表双方在战略合作协议书上签字，华侨大学生物医学学院院长许瑞安与德化县医院院长李松川分别代表双方签署合作协议。华侨大学校长贾益民、德化县县长欧阳秋虹并在德化县医院大门外为“华侨大学附属德化医院”揭牌。

出席签约仪式的有华侨大学校长贾益民、副校长吴季怀、校长助理彭霈和张云波，校长办公室、发展规划处、人事处、教务处、科学技术研究处、社会科学研究处、美术学院、生物医学学院和泉州科学技术与社会发展研究院等相关单位负责人，以及德化县委书记吴深生、县长欧阳秋虹、人大主任涂健圻、政协主席苏兴羽等四套班子成员及其他县直单位负责人。

根据战略合作协议，华侨大学与德化县将就双方的中长期发展规划、专项实践等问题开展调研、进行科学论证研究；以项目为载体，联合申报国家级、省级项目，开展横向课题研究，共同推进技术创新，推进产学研合作；开展学术讲座，进行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难题攻关；利用智力资源密集的优势，为社会发展提供科技支撑和智力支持；共建行业创新平台，联合申报国家、省部级重点实验室、工程研究中心等科技创新基地；建立校企对接机制；创造条件，在工艺美术、医疗卫生、继续教育、旅游服务、人才培育等方面开展深度合作。

根据协议，德化县医院将作为“华侨大学附属德化医院”，依托华侨大学品牌、人才、教学、科研的资源优势，推动德化县医院由医疗服务为主的临床型医院向医疗、教学、科研同步发展的教学型医院的转变，进一步提高医院科研创新能力和医疗技术水平，逐步将德化县医院建成一所群众满意、政府放心、医教研兼丰的三级综合性医院和临床科研教学中心，推动德化医疗卫生事业的全面发展。

10 月 18 日，我校与中国科学院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海西研究院）在厦门校区签订合作协议。我校校长贾益民和中国科学院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所长曹荣分别代表双方在战略合作框架协议、联合培养研究生协议、科研合作框架协议和装备制造科研合作框架协议上签字。

我校副校长吴季怀、徐西鹏，校长助理张云波，校长办公室、发展规划处、人事处、研究生院、科学技术研究处、机电及自动化学院、材料科

学与工程学院、化工学院、厦门工程技术研究院等相关单位负责人，中科院福建物构所副所长兰国政，以及福建物构所相关部门负责人等见证签约。

双方签署的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在人才培养与交流、合作开展科学研究和共建技术研发平台上达成一致；签署的联合培养研究生协议，在研究生招生、培养、管理及学位授予等工作上达成协议；签署的稀土所科研合作框架协议，在化学及材料领域建立合作交流小组、开展合作研究与仪器资源共享、联合培养研究生、共建创新平台、联合开展重大课题攻关及成果转化等方面促成合作；签署的装备制造科研合作框架协议，加强了双方在装备制造领域科研开发、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等方面的合作，实现优势互补、资源共享、成果对接。（发展规划处）

六合院董事长朱志悦捐资500万元 设立华大海上丝绸之路研究院研究与发展基金

10月15日，六合院（福建）古典艺术家具有限公司董事长朱志悦捐资500万元，在我校设立华侨大学海上丝绸之路研究院研究与发展基金（六合院基金），支持学校的海丝研究。华侨大学校长贾益民与朱志悦在泉州校区陈嘉庚纪念堂共同签署了捐赠协议。捐赠仪式结束后，朱志悦还为华大师生作了《中国红木家具的发展方向》的专题讲座。（华大新闻网）

我校教师近日获多项重要成绩

近日，我校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熊兴泉副教授获得国际埃尼奖（Eni Award）学术秘书处提名，成为该奖项2015年度环境保护领域的正式候选人。目前该奖项正在评审中，将于2015年5月宣布结果。国际埃尼奖被国际能源界誉为最负盛名的非官方诺贝尔奖，是能源与环境研究领域最权威

的奖项之一。

7 月，我校美术学院应法国布鲁诺艺术基金会邀请，赴法国巴黎国际艺术城进行为期两个月的创作研修与文化交流，并于日前在巴黎国际艺术城举办个人油画作品展。

近日，福建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福建省教育厅发布《关于表彰福建省优秀教师和福建省优秀教育工作者的决定》，我校土木工程学院郭子雄、文学院马华祥、体育学院程一辉、附属中学黄秋玉等 4 名教师榜上有名，荣膺“福建省优秀教师”称号。（华大新闻网）

本期送：校领导，纪委，党委各部（室），工会、团委，
各学院、处（室）、直属单位。

网址：http://fzghc.hqu.edu.cn/ 邮箱：hqdxfzghc@163.com

内部资料 妥善保存 **责任编辑：张丽萍**